

于右任诗词曲全集

典藏版

于媛●主编

道

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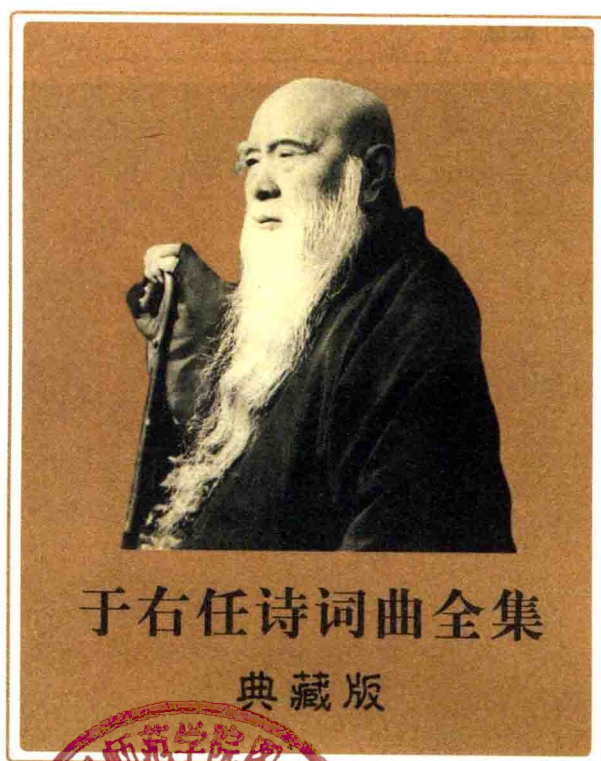
之四 非少歌

蘇軾於眉山之卜安

雲我鄉

鄉不事也

亦不



顾问 霍松林 周 明 钟明善
张应超 王民权 张佐鹏
赖灿贤 高 峡 张乐荪
李 铠 李振中

主 编：于 媛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西安 北京 广州 上海



前言^①

说来我和于家也真是有缘分。

那是2004年的9月，听说于右任先生的侄孙女、西安于右任故居纪念馆馆长于媛来京住在民革中央，筹备“纪念于右任先生著名爱国诗作《望大陆》发表40周年暨于右任先生书法真迹展”，基于对于老的尊崇和对于老书法的热爱，我们高兴地见了面。谁知，于媛正在为展出场地发愁，原定在国家博物馆展出的计划，因展馆改造装修暂无法使用，其他地方不是条件不够档次，就是展品安全和具有国家领导人参加活动资格的场所很难找。

因此，我提出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展出的设想，因为我们馆是新建的具有东方一流水平的展馆，除了络绎不绝的国内外专家、学者、青少年不断到馆参观交流，也常有中央领导到馆里参观。

在这样的大型文化殿堂，为于右任先生举办书法真迹展，规格环境应该说是合宜的，安全也有保障。

经过我馆和民革中央、陕西省民革、西安于右任故居纪念馆的共同商定，展览终于于2004年11月30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隆重展出。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何鲁丽，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忠禹，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周铁农以及中央有关各党派、各部门领导、各界人士等三千余人出席了开幕式。

从布展到结束，共计用了一周时间，此时，对于于先生的每一件作品可以说我都是零距离接触，尤其对于老各个时期的代表作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我发现，于老的书法愈到晚年愈出神入化，外柔而内刚，笔简而神定，落落大方而心平气和，平易近人而情深意厚，在跌宕起伏中表现出动人的节奏感和醉人的神韵美。这对我来说是一次不可多得的极好学习机会。

展出后不久，于媛主编出版了《于右任书联集锦》，这本书基本囊括展出

① 此文为2006年出版《于右任诗词曲全集》之前言。



中的书联作品。许多名家看后赞不绝口，评价很高。该书已再版重印，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大陆和台湾，关于于先生遗墨出版中比较精美的书籍，作为于氏后人，能把事情办到这个水平，于老在天有知他会感到欣慰的。

今年初，我又接到于媛女士的多次电话，她又要出版一册《于右任诗词曲全集》，约我为此书写序言，虽然我生长在陕西，青少年时代就知道于右任是国民党元老、杰出的书法家、诗人，标准草书的创立者，然毕竟对于老的诗歌还没有更深的研究。但出于对于老的热爱和敬重，我再一次找出我在大学时期收藏的《于右任诗选集》，从辛亥革命前的《杂感》“柳下爱祖国……”读到1962年的《望大陆》遗歌，从于先生的千余首诗、词、曲中，使我深刻地体会到，于先生的思想、情感无论是早期的愤怒直呼，或者晚年的悲痛抒怀，都没有逃避社会现实和脱离人民劳苦大众，是一部凝结中华近代史的史诗，它再现了先生那颗赤热的爱国、爱民之心，坚贞不渝地救国救民之志，刚直不阿的高尚品格，质朴无华的平民作风。他的诗歌一直贯穿了爱国主义精神的激情，爱国主义在他的诗歌里是一曲波澜壮阔的主旋律。

于右任先生的青少年时期，时值国家内忧外患灾难深重之时。于先生自幼接受进步学者朱佛光、毛俊臣等人熏陶，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己任，青少年时代他就以文天祥、谢叠山为楷模，确立了推翻清朝统治，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和远大胸怀。从他22岁写的《杂感》“柳下爱祖国，仲连耻帝秦……”一诗中即可看出他的“报仇侠儿志，报国烈士身”的豪情壮志。那时候清政不纲，帝国主义八国联军列强侵入北京，慈禧太后母子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逃到陕西，他在《兴平咏古》中“女权滥用千秋戒，香粉不应再误人”，于先生欲上书陕西巡抚岑春萱，请其手刃西太后和光绪皇帝，为同学阻拦。“太平思想何由见，革命才能不自囚”，当他一旦认识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和民族灾难深重的时候，即勇敢地投身于以孙中山为首的，以反清为主要对象的民族、民主革命潮流中，他的《从军乐》“中华之魂死不死，中华之危竟至此！同胞同胞为奴何如为国殇，碧血斑斓照青史”，就是这一指导思想真实写照。在这个时期，他南走上海，东渡日本，办报办学，著文写诗，反封反帝，宣传革命，不遗余力。成为一名社会活动家，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风云人物之一。

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对宋教仁先生下毒手，于右任是目击者，他悲



愤之极，撰写悼词“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记？”原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共和”胜利了，在一片胜利声中，革命果实却落在了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投机善变的旧势力手中，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被袁世凯代替，黄兴被打败，宋教仁被刺死，旧势力已当权，广大群众的真正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立即遭到残酷镇压。在这种形势下，于右任先生开始意识到国民党在辛亥革命中脱离基层人民群众的支持，如鱼“失水”，依靠军阀、帮会闹革命的那一套作法值得思考，且国民党人缺乏“真才”，许多人对此尚不认识。而他在《出京》中写道：“几见神龙愁失水，始知屠狗少真才。无端宣武门前啸，声满人寰转自哀。”此时的于右任积极支持和追随孙中山“二次革命”，反袁护国，后又回陕督师，继续与北洋军阀斗争，虽几经挫折，他没有退却，仍奋斗不息。直到1924年1月，参加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赞成国共合作，拥护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他认为国共两党宜合不宜分，他提出了“分则两损，合则两益”的正确主张。

1926年北伐中，于右任经李大钊派遣赴苏联邀请冯玉祥回国，重整旧部，进军西北，策应北伐战争并解西安之围。在莫斯科他受到列宁和十月革命、苏维埃社会主义先进思想的影响，他有感而发地写出了四十多首歌颂列宁和十月革命、克里姆林宫、红场的诗歌，如“一片红场红又红，照耀世界日方中。列宁同志何曾死？犹呼口号促进攻”。他联想到辛亥革命的失败，认为“转悔当年起义早，方法不完得不保”。1926年5月，于右任作《舟入黄海》诗歌一首，诗中这样写道“苍髯如戟一战士，何日完成革命史？大呼万岁定中华，全世界被压迫之人民同日起！”由此可以看出，于先生当时对中国大革命激情满怀，并且预料革命的胜利，就在他这首诗歌写成不久，他也万万没想到，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势力，竖起了叛变中国大革命的反旗。1927年大革命失败，蒋介石反共剿共，倒行逆施。特别是“九·一八”后，蒋介石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和对国内各地赴南京请愿学生的大肆镇压，更加引起了于右任的不满。

抗日战争时期，于先生赞成团结抗日，赞成国共两党二次合作，并且同中国共产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1938年1月《新华日报》创刊，于先生受周恩来之托书写了报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他反对蒋介石挑动内战，主张和平建国；



于先生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十分钦佩，在重庆谈判期间，他以国民党元老身份宴请毛泽东、周恩来，当他得知国民党内有人要对毛泽东下毒手时，采取将计就计策略，直接质问蒋介石，保证了和谈期间毛泽东的人身安全。

解放战争后期，于右任一直希望国共和谈成功。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总统之后，他曾打算北上参加国共两党的北京会谈，周恩来同志对此十分欢迎。于先生在1949年给《闻文白自北平来电有感》中感怀“彩凤身无双羽翼，雕笼何日启重天？”由此，更能理解于先生在坚持国共再次合作的迫切心情。

由于国民党政府顽固拒绝在《国内和平协议》上签字，国共和谈破裂，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南京政府迅速土崩瓦解，逃至台湾，于右任于1949年11月，被迫离开大陆。在台湾孤岛上他经常思念大陆，思念故乡，先生越是到晚年，思乡之情越殷，企盼祖国早日统一，如1951年，在台北《生日游草山》中“白头吟望中原路，待我归来寿一杯”，1952年，《再游柑橘示范场》“同人争向中原望，天放晴光亦快哉”，1955年，于先生在《高雄道中》“闻说人间新灌溉，十年万能井成功”，1957年，《题林家绰写牧羊儿自传》“夜深重读牧羊记，梦绕神州泪两行”，1958年于先生《作明月诗二首》“痛心零落南来雁，不忍哀号过战场”，在他写《书钟槐村先生酬恩诗后》“垂垂白发悲游子，隐隐青山见故乡”，同年又写《忆内子高仲林》“梦绕关西旧战场，迂回大队过咸阳；白头夫妇白头泪，亲见阿婆作艳装”，1959年《望雨》“更来太武山头望，雨湿神州望故乡”，1961年，作《有梦》“夜夜梦中原，白首泪频滴”，1962年，作《梦中有作，起而记之七绝》“剪断云霾天欲晓，划开时代气方新。昨霄梦入中原路，马首祥云照庶民”，也就是在同年的元月24日，于先生写下了震撼世界的不朽爱国诗歌《望大陆》，诗中无限悲痛地抒发了先生对故乡，对大陆的怀念之情，也表达了台湾海峡两岸骨肉同胞渴望祖国统一的心声：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宋代的著名爱国诗人陆游，辞世之前，留下一首《示儿》，诗人到死都没有看到“九州同”。于先生岂不也是如此，他带着难以瞑目的遗憾没有看到祖国的统一，《望大陆》不愧为于先生一生中的巅峰之作，也是他的千古绝唱，先生欲将血泪寄山河。正如2003年3月18日，温家宝同志当选总理后，在举行的第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回答台湾记者提问：“对两岸关系的看法”时，他说：“说起台湾，我很动情，不由得想起了一位辛亥革命的老人，国民党的元老于右任在他临终前写过的一首哀歌”，温总理当众吟咏了于右任先生的这首《望大陆》诗，并说“这是震撼中华民族的词句”。于右任先生的忠诚爱国之情是始终如一的，如今诗人的知音温家宝总理再一次向世人宣告，这也是对先生在天之灵的告慰。我们坚信：台湾迟早要回归祖国，国家一定要统一。当台湾回归祖国，国家统一的那一天，我们一定会告慰于翁的。

于媛主编的这本《于右任诗词曲全集》收集了1156首，可以说这是于先生逝世四十年后，收集最全的诗歌集。在这些诗歌中记述了近代以来许多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与社会现实写照，于右任先生的诗，曾经激励过几代人的革命情怀，他的诗篇历久而弥足珍贵，堪称是一部厚重的爱国主义史诗。

这一部《于右任诗词曲全集》的搜集、整理、编辑和出版，无疑凝注了主编于媛及编委们的辛勤劳动。他们的辛劳和奉献相信海峡两岸和世界华人的读者是不会忘记的。

今天，我们重读于右任先生的名篇佳作，对于激发我们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更有着强烈而深远的现实意义和深刻启示。

是为序。

二〇〇六年阳春三月，北京



周明，著名作家，编审。西安周至人。先后就读于西北艺术学院文学系和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于兰州大学。历任中国作协青年文学刊物《文艺学习》编辑、记者，《人民文学》杂志常务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创作联络部常务副主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兼任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冰心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茅盾研究会秘书长，世侨总会文化发展委员会主任。《中华风》杂志社社长及内地和香港几家大型刊物的编委和顾问。

出版的著作计有《榜样》、《在莽莽的绿色世界》、《泉水淙淙》、《又是一年春草绿》、《记冰心》、《远山红叶》、《五月的夜晚》、《那年冬天没有雪》、《为霞满天》、《雪落黄河》、《山河永恋》、《没有讲完的童话》等。其中有些作品获奖，有些被国外翻译出版。



序

论于右任诗的创新精神^①

霍松林

于右任先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清末创办《神州报》、《民呼报》和《民立报》，宣传革命思想，反对清朝专制，是我国新闻事业的先驱者之一。他又主持震旦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公学，在发展我国教育事业方面做了贡献。他是长期享有世界声誉的书法家，中年以后，书名日高，几乎掩盖了他的诗名。其实，他的诗歌和他的书法可以说是“双峰并峙”。在书法史和诗歌史上，他都奠定了牢固的地位。

下面就于先生的诗谈一点感想。

1930年春，《右任诗存》刊行的时候，柳亚子题了八首七绝，对这六卷诗及其作者充满热情地给予了赞扬。诗如下：

落落乾坤大布衣，伤麟叹凤欲安归？
 芽卅年家国兴亡恨，付与先生一卷诗。
 茅店霜鸡剑影寒，几回亡命度函关？
 选书生已办忧天下，莫作山东剧孟看。
 义师惜未下咸阳，百战无功吊国殇。
 寒角悲笳穷塞主，可怜我马已玄黄。
 贝加湖水碧潺湲，去国中胥往复还。
 已换赤明龙汉劫，那堪回首列宁山。
 虎踞龙蟠旧石城，当年失计误迁京。
 不须更怨袁公路，南朔而今有战争。
 苍黄阳夏筹兵日，辛苦钟山仰望时。
 终遣拂衣归海上，高风峻节耐人思。
 泰玄墓畔桂千丛，尚父湖边夕照红。
 稍惜江南哀怨地，小戎驷铁换秦风。
 廿载盟心结客场，使君风谊镇难忘。
 怜余亦有穷途感，才尽江淹鬓未霜。

这本《右任诗存》，收录了于先生1930年以前约三十年的作品，由王陆一笺注。柳亚子以“卅年家国兴亡恨，付与先生一卷诗”两句论定了它的时代内容和“诗史”价值。我个人认为，于先生的诗歌创作，可分为四个时期。辛亥革命（1911年）以前十来年为第一期；辛亥革命以后至1927年为第二期；

^① 此文为2006年出版《于右任诗词曲全集》时所作序。



1927年至抗日战争胜利为第三期；抗战胜利至他1964年逝世为第四期。而最有价值、最能体现于先生创作新精神的诗，则主要在第一、二期。于先生中年以后，诗名逐渐被书名所掩，也不是偶然的。

辛亥革命以前十来年，戊戌变法失败（1898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1900年）。一系列历史事件证明了清王朝的腐朽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破产。因而在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不断高涨的基础上，形成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其目的是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于先生乃是这一革命运动的先行者、倡导者之一。而他的诗歌创作，正是从这一革命运动中吸取力量、又反转来为它服务的。且看《杂感》的第一首和第三首：

柳下爱祖国，仲连耻帝秦。子房抱国难，椎秦气无伦。报仇侠儿志，报国烈士身。寰宇独立史，读之泪盈巾。逝者如斯夫，哀此亡国民！

伟哉汤至武，革命协天人。夷齐两饿鬼，名理认不真。只怨干戈起，不思涂炭臻。心中有商纣，目时无商民。叩马复絮絮，非孝亦非仁。纵云暴易暴，厥暴实不伦。仗义讨民贼，何愤尔力伸？选吁嗟莽男子，命尽歌无因。耗矣首阳草，顽山惨不春。

第一首抒发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祖国独立的豪情壮志，把“耻帝秦”、“抱国难”、挽救危亡、争取独立作为“爱祖国”的主要内容，给传统的爱国思想带来了新的特点。而洋溢着具有新的特点的爱国主义激情，是于先生的诗歌，特别是第一、第二两期诗歌的鲜明特点。

第一首反帝，第三首反封建。伯夷、叔齐反对武王伐纣，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历来受到称赞，韩愈就写过《伯夷颂》。于先生对伯夷、叔齐却没有颂，而且指斥他们“心中有商纣，目时无商民”。把清朝统治者斥为商纣，大声疾呼，要求伐纣救民，这是难能可贵的。在此后的诗作中，还不时出现“不为汤武非人子，付与河山是泪痕”（《出关》），“乘时我欲为汤武，一扫千年霸者风”之类的句子，表现了献身革命、威武不屈的英雄气概。

新的内容突破了旧的形式。于先生第一期的诗，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富于创新精神。请看《从军乐》：

中华之魂死不死，中华之危竟至此？选同胞同胞为奴何如为国殇，碧血斓



斑照青史。从军乐兮从军乐，生不当兵非男子。男子堕地志四方，破坏何妨再整理。君不见白人经营中国策愈奇，前畏黄人为祸今俯视。侮国实系侮我民，似尔侃侃胡为尔？芽吾人当自造前程，依赖朝廷时难俟。何况列强帝国主义相逼来，风潮汹恶廿世纪。大呼四亿六千万同胞，伐鼓研金齐奋起？

篇无定句，句无定字，形式比较自由。全篇多用七字以上的长句，大气盘旋，热情喷涌，而以“大呼”结尾，尤足以发聋振聩。

这些诗，原收入《半哭半笑楼诗集》中，是“民国纪元十年前”即1902年以前的作品。这时候，资产阶级改良派“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的“诗界革命”（实际是诗歌改良）已成过去；形式拟古、内容空虚的“同光派”诗，泛滥诗坛。于先生这些诗篇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半哭半笑楼诗集》刚在三原刊印，就不胫而走，到处传诵，引起了清朝统治者的恐惧。1903年，于先生正在开封应试，却遭到缇骑缉捕，变姓名逃脱，始免于难。这一事实，也足以说明于先生第一期的爱国诗章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多么巨大的威力。

有些人说于先生是“南社”诗人。这当然不算错。因为于先生与柳亚子等南社诗人交好，参加过南社的创作活动。但应该弄清，“南社”成立于1909年，而于先生第一期的诗，却创作于1902年以前。南社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进步诗社，对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对清朝专制统治，起过积极作用。而于先生第一期的诗歌创作，实开“南社”之先河。

于先生第二期的诗歌数量较多，内容、风格都具有多样性。最富创新精神的，则是1926年往返苏联时期的作品。于先生把这些诗编在一起，题为《变风集》，其意正在于突出其创新精神。且看《舟入黄海作歌》：

黄流打枕终日吼，起向舵楼看星斗。一发中原乱如何，再造可能得八九？芽神京陷后余亦迁，奔驰不用卖文钱。革命军中一战士，苍髯如戟似少年。呜呼？选苍髯如戟一战士，何日完成革命史？选大呼万岁定中华，全世界被压迫之人民同日起！

再看《东朝鲜湾歌》：

晨兴久读《资本论》，掩卷心神俱委顿。忽报舟入朝鲜湾，太白压海如衔恨。山难移兮海难填，行人过此哀朝鲜。遗民莫话安重根，伊藤铜像更巍然。



吾闻今岁前皇死，人民野哭数十里。又闻往岁独立军，徒手奋斗存血史。世界劳民十万万，阶级相联参义战。何日推翻金纺锤，一时俱脱铁锁链？芽噫吁嘻？选太白之上云飞扬，太白之下人凄怆，太白以北弱小民族矜解放，太白以南以东以西被压迫者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复如狂。山苍苍兮海茫茫，盟山誓海兮强复强。歌声海浪相酬答，天地为之久低昂。舟人惊怪胡为此，此髯歌声犹不止。万里转折赴疆场，我本国民革命军中一战士。

“诗言志，歌永言。”从这两首长歌所表现的“志”看，于先生的社会理想这时候出现了新的飞跃。作为“战士”，他因急于实现这种理想而热血沸腾，不能自己。溢而为诗，就像大江暴涨，一往无前，浑灏流转，气象万千。真有“大声吹地转，高浪蹴天浮”的气概。

传统诗歌中的“歌行”这种体裁，本来比较自由，适于表现奔放的情感和复杂的事态。于先生这时期的诗歌创作，最善于发挥歌行体的特长，并在此基础上创新。让我们来读《克里木宫歌》：

君何事来翻吊古，克里木宫矜一睹。置身赤色莫斯科，结习不忘真腐腐。世人莫误悲铜驼，请述怪异作哀歌。宫内教堂即坟墓，历代皇室铜棺多。沙皇铸钟巨无仿，更制巨炮长盈丈。炮无人放钟不鸣，两都红旗已飘荡。故宅既作苏维埃，遗民复袒共产党。无产阶级革命竟成功，新旧世界由此划为两。吾闻革命之时经剧战，宫内宫外两阵线。列宁下令用炮轰，门内白军方自变。又闻宫门旧有断头台，台前血渗野花开。台上杀人城上笑，百年骈戮真堪哀。自今门外号红场，功成之后葬国殇。列宁以下殉义者，一一分瘞傍宫墙。宫墙兮墓道，墓道兮多少？选上悬革命之红旗，下种伤心之碧草。悠悠苍天我何人，万里西征头白了！

再读《红场歌》：

中山已逝列宁死，莫斯科城我来矣？选遗骸东西并保存，紫禁红场更相似。每日排队朝复暮，争看列宁人无数。我亦蹙蹙诣红场，为全人类有所诉。一片红场红复红，照耀世界日方中；列宁诸烈何曾死，犹呼口号促进攻。噫吁嘻？选东方羁束难自解，吾党改组君犹待。君之主张东方之民久已闻，君之策略东方之事莫能改。何况共同奋斗救中国，中山遗命赫然在。转悔当年起义早，方法不完得不保。如今愁苦呼声遍亚东，大乱方生人将老。头白伶仃莫斯科，惭



感交并责未了。未了之责谁余助？芽至此翻思进一步。为全人类自由而进征兮？芽解放东方之大任先无误。吊中山之良友兮，知取则之不远。信吾党之必兴兮，夫孰荷此而无忝？芽惆怅兮将别，歌声兮哽咽。酬君兮全世界奴隶之泪，奠君兮全世界豪强之血。献君兮全世界劳民之铁链，奏君兮全世界历史之灰屑。君之灵兮绕世界而一视，时不久兮全设。红场歌兮声悲切！

与此同时，还做有《布蒙共和国立国五年纪念歌》，以“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此乃马克思以及列宁革命之口号”开头，历叙布利亚特人民受压迫的历史及十月革命成功以后的幸福生活。然后描写了他所参加的各种盛大的庆祝场面和“露天大宴”。结尾由“响彻云衢国际歌，天将明矣唱未央”转向主观抒情：

嗟余转折二万里，七日乌城发白矣？选苍隼护巢蜀不归，神龙失水犹思起。乌城西安一直线，昨梦入关督义战。尽烹走狗定中华，一行解放四万万。碧云寺上告成功，山海关前开祝宴。老来有志死疆场，竟把他乡当故乡。夜半梦回忽下泪，马角乌头困大荒。天怜辛苦天应晓，促我整顿乾坤了。赐我布蒙国内小山庄，万松深处容一老。

这些诗的创新精神首先表现在思想新、感情新。忧心四亿劳民的苦难，高呼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追求全人类的自由解放，歌颂十月革命成功所开辟的新世界。如此光辉的新思想，如此炽烈的新感情，充溢于字里行间，怎能不令人耳目一新？其次是选材新、取境新。异域之山川云海，外国之历史风俗，红场上瞻仰列宁遗容的人流，克里姆林宫的巨钟巨炮和迎风飘荡的红旗，这一切与前述的新思想、新感情熔铸而成瑰奇宏丽的新意境，令人目眩神摇，精神振奋。第三是语言新、形式新。许多新名词、新术语、新口号络绎笔端，五彩缤纷。而多音节的名词、术语和口号的大量运用，冲破了五、七言句的老框框。例如《布蒙共和国立国五年纪念歌》的中间数句：“忽然天开地辟日月光，十月革命成功兮，实现苏维埃社会主义之联邦。民无异国兮地无四方，布蒙民族从此得解放。”作者把“十月革命”、“苏维埃社会主义”等多音节的词汇都驱遣于笔下，自然就出现了许多长句。有些长句，又吸收了散文的造句方法，使诗句更有弹性，更富表现力。“太白以北弱小民族矜解放，太白以南以东以西被压迫者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复如狂”两句，就是一个例子。当然，诗毕竟是诗，

足以提高艺术表现力的散文化是需要的；有损于诗的意境美、音韵美的散文化则应该避免。比较而言，《布蒙共和国立国五年纪念歌》的前半篇，是有过分散文化的不足的。

我们说于先生的歌行富于创新精神，并不意味着他的近体诗毫无突破。近体诗，包括律诗和绝句，早在盛唐时代就已经定型。格律极严，必须恪守；不合格律，就不能算近体诗。因此，写近体诗而要体现创新精神，就十分困难。标榜“诗界革命”的维新派诗人是“捋址新名词”以显示诗作之新的。但如果只着眼于语言新，那还不足以体现创新精神。创新，既要语言新，更要题材新、思想感情新。结合起来，要意境新，要唱出时代的新声。于先生的不少近体诗，特别是第一、第二时期的近体诗，是有新的意境的，是唱出了时代的新声的。

1903年，于先生被清廷追捕，奔赴上海。经南京时做《孝陵》七绝云：“虎口余生亦自矜，天留铁汉卜将兴。短衣散发三千里，亡命南来哭孝陵。”其意境之阔大，风格之豪迈，都跨越前人。而最重要的，还在于有新意。有为振兴中华而献身革命的新思想、新感情。

赴苏联途中作《舟入大彼得湾》七绝云：

二百余年霸业零，天风吹尽浪花腥。掬来十亿劳民泪，彼得湾中吊列宁。

第一句，用一个“零”字，将彼得大帝建立的“二百余年霸业”一扫而空。第二句以“浪花”紧扣“大彼得湾”，而以“腥”字概括“二百余年霸业”，深刻、新警，令人叹服。当然，“天风”和“腥”，都是诗的语言。不是大彼得湾的浪花真的飘满血腥，也不是真的有什么“天风”把那“浪花腥”吹尽；而是说，那“二百余年霸业”被十月革命推翻，血腥的统治已一去不返。这层意思，不是我们猜出来的，而是作者从三、四两句诗中表现出来的。“彼得湾”以彼得大帝得名。彼得大帝与列宁，各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制度和历史时代。作者构思的新颖之处，在于他把极端相反的两个人物摆在一起，创造了“彼得湾中吊列宁”的警句，于强烈对比中引导读者回顾霸权统治的历史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而以“零”字“腥”字，表现对前者的态度，以劳民之泪“吊列宁”表现对后者的感情，内涵深广，耐人寻味；爱憎分明，发人深省。

于先生擅长七律。仅就靖国军时期的作品看，沉雄悲壮，感慨苍凉，反映了时局的危殆、人民的苦难和作者的忧愤，具有“诗史”价值。而技巧之精湛，



风格之老健，炼字、锤句、谋篇之完美，也令人倾倒。总的说来，这些七律的新，表现在作者以目击、参与者和领导者的深切感受和炽烈情感，艺术地表现了那一个时代的政治风云、军事斗争、人民命运、国家前途。分别而言，又各有新颖之处。例如《民治校园纪事诗》二十首，用植物名六十余种，以植物学之论据，写校园中之景物，而以景寓情，因物托事，靖国军之艰难处境和作者力挽危局的苦衷，历历如见。香草美人，托物寄兴，这是《离骚》以来常用的手法；于先生的这二十首七律，则为传统的比兴手法的运用打开了新的天地。

“五四”以来的“新诗”创作有很大成绩，但还有民族化、群众化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我国被誉为诗的国度。我国传统诗歌的民族形式，既不应该一下子全盘抛弃而代之以外来形式，也不应墨守成规，故步自封，写那种与古人的作品没有两样的“旧体诗”。要繁荣社会主义诗歌，“新诗”作者应学习传统，使自己的作品更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不应割断传统，强调从外国移植。除此以外，也还可以运用传统诗歌的各种形式反映两个文明建设，反映新的时代、新的人物，不断推陈出新。近几年，做“旧体诗”的人多了，诗社、诗刊，也不断出现。“新诗”人颇以“旧体诗泛滥”为忧。有些人压根不懂近体诗的格律，却把自己的作品叫“律诗”；另一些人勉强讲平仄和对仗，但为格律所束缚，写出的东西毫无诗意。这样的东西泛滥，的确不太好。但是第一，凡事总有个学习过程；第二，从晚清以迄现在，能驾驭传统诗歌的各种形式，写出优美诗篇的人，始终是有的，不应忽视这支力量，更不应歧视。值得一提的是：有不少修养很深的老诗人，写起“旧体诗”来，力求典雅、古奥，不敢创新，连新词汇都不用，也不同意别人用。针对这种现状来读于先生的诗，注意一下他在内容和形式方面的创新精神，是很有意义的。

于先生作诗力求创新，是自觉的，有理论的，早在1902年前所做的《和朱佛光先生步施州狂客原韵》一诗里说：“愿力推开老亚洲，梦中歌哭未曾休……太平思想何由见，革命才能不自囚。”一个发愿以革命手段推开“老亚洲”而迎接“新亚洲”的人，作诗也自然主张创新。他称赞杜甫，则着眼于“大哉诗圣，为时代开生命”；评价李白，则突出其“三杯拔剑舞龙泉，诗家血色开生面”。关于陈子昂在初唐诗歌发展中的历史功绩，他更讲得中肯、透辟：



徐庾而还至射洪，划开时代变诗风。不为四杰承徐缙，自是初唐一大宗。

——（《陈含光先生七十九大庆》）

这是说，陈子昂（射洪）改变了徐陵、庾信以来繁缛靡丽的诗风，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而超越四杰（王、杨、卢、骆）而成初唐诗坛的大宗。《诗变》一篇，更通篇论诗，强调“变”：

诗体岂有常？诗变数无方。何以明其然，时代自堂堂。……

这是说，诗体没有永远不变的框框。时代在不断地发展变化，诗，也自然跟着发展变化。不变，就脱离了时代，落后于时代。1955年诗人节，他在台南诗人的集会上说：

……执新诗以批评旧诗，或执旧诗以批评新诗，此皆不知诗者也。旧诗体格之博大，在世界诗中，实无逊色。但今日诗人之责任，则与时代而俱大。谨以拙见分陈如下：一、发扬时代的精神，二、便利大众的欣赏。盖违乎时代者必被时代摒弃，远乎大众者必被大众冷落。再进一步言之，此时代应为创造之时代。伟大的创造，必在伟大的时代产生；而伟大的时代，亦需要众多的作家以支配之，救济之、并宣扬之，所谓江山需要伟人扶也。此时之诗，非少数者悠闲之文艺，而应为大众立心立命之文艺。不管大众之需要而闭门为之，此诗便无真生命，便成废话，其结果便与大众脱离。此乃旧诗之真正厄运。

……一方面，诗人的喉舌，是时代的呼声；一方面，诗人的思想，是时代的前驱。以呼声来反映时代的要求，以思想来促使时代的前进。而诗人自己，更应当是实现此一呼声与思想的斗士。

“旧体诗”要“发扬时代精神”，“违乎时代者必被时代摒弃”；“旧体诗”要“便利大众的欣赏”，“远乎大众者必被大众冷落”。这些话，应该说是讲得相当精辟的。而“旧体诗”要“发扬时代精神”，就有创新的问题；“旧体诗”要“便利大众的欣赏”，也有创新的问题。歌行之类的古风，形式比较自由，创新较易着手，而已经定型了十几个世纪的近体诗，究竟该怎么办？我去年参加过岳麓诗社和南岳诗社的讨论，大家对这个问题都提不出什么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不妨让我们看看于先生的意见：

我的意思……诗应化难为易，接近大众。这个意见，朋友中间赞成的固然很多，但是持疑难态度的亦复不少。这个原因，一是结习的积重难返，一是没



有具体办法。习惯是慢慢积成的，也只有慢慢地改变。我今天特向大会提出两点意见……

一、平仄——近体诗的平仄格律，完全是为了声调美。但是，现在平仄变了，如入声字，国语多数读平声了，我们还把它当仄声用。这样，我们的诗，便成目诵的声调，而不是口诵的声调了？选所谓声调美，也只成为目诵的美，而不是口诵的美了。

二、韵——诗有韵，为的是读起来谐口。但是后来韵变了，古时在同韵的，读起来反而不谐；异韵的，反而相谐。如同韵的“元”、“门”，异韵的“东”、“冬”。而我们今日作诗，还要强不谐以为谐，强同以为异，这样合理吗？芽但是这种改变，并不自今日始。词的兴起，是一种革命，它把诗韵分的分，合的合，来了一次大的调整。元曲又是一种革命，那些作者认为词韵的调整还不够，所以《中原音韵》，连入声都没有了。……古人用自己的口语来作诗，我们用古人的口语来作诗，其难易自见。我们想要把诗化难为易接近大众，第一先要改用普通语的平仄与韵，这是我蓄之于心的多年愿望。我过去，话实在说得太多了。但是，我总觉得国家今日固然不可无瑰丽的宾馆，但更需要多兴平民的住宅？选国如斯，诗亦如斯！

于先生是一位博览群书，拥有六十多年诗歌创作经验的老诗人，他探求诗歌发展的历史轨迹，总结自己的创作实践，从诗歌与时代、诗歌与大众的血肉联系中，阐述了诗歌必须创新的理论，并为旧体诗形式方面的革新提出了具体的设想，很值得我们参考。

在台湾，于先生是经常思念大陆、思念故乡的。1957年《题林家绰写〈牧羊儿自传〉》云：

夜深重读《牧儿记》，梦绕神州泪两行。

《四十七年重九北投侨园》云：

海上无风又无雨，高吟容易见神州。

1958年《书钟槐村先生酬恩诗后》云：

垂垂白发悲游子，隐隐青山见故乡。

1961年《有梦》云：

夜夜梦中原，白首泪频滴。